

精神涅槃

船夫

北京燕山出版社



忧患的民族自责

明朗的舆论倾斜

豪放的思维跳跃

露骨的精神较量

精 神 涅 槃

聖 卡 莫

北京燕山出版社

精 淬 涅 柒
船 夫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 字数66.7千字
1989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0162-2/D·0008

印数：1—10000 定价：1.50元

前　　言

本文虽洋洋数万言，却全是“跟着感觉走”的内心呼唤，是一群杞人忧天的热血炎黄子孙发自丹田的呐喊。因此，“精神涅槃”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超理性系统牢骚，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光泽、偏激气质和跳跃形式，但就其主导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还是自我感觉良好的。

当今中国是一个不同时代并存的复杂社会。各种文化交织撞击冲突，构成了一幅反差鲜明的矛盾局面。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文化现象根本无法采用简单的黑白判断进行分析，生活本身是一面多棱镜。我们的进步与倒退、快乐与忧虑、机会与麻烦常常非常和谐地存在于一个文化共同体，这就迫使人们对一种社会现象采取又骂又夸的矛盾思维模式。此文就具有这一时代文化特征。

曾几何时，万名青年在首都体育馆齐声高唱“一无所有”。这一文化奇观使人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系统到底出了什么故障。几年的甜酸苦辣使大家扪心自问：在对外开放中要不要有一点民族自卫心理，在强调改革必要性时要不要讲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发展商品经济时要不要提一点奉献精神。这一系统反思把再塑民魂这一历史课题严肃地摆在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我们正是斗胆就此抛砖引玉，希望借以勃发能导致争论的思考。

我们本无意与理论界的朋友展开学术争论。我们的全部

企图只是想露骨地讲一点中国老百姓的实话。一位哲人说过，搞政治就是左一下右一下，本文虽非搞政治，但却也是“左右逢源”，既打破左的枷锁，又冲破右的桎梏，其根本的思想原则是实事求是和两个基本点。

编 者

1989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贫 困	(2)
1.1 殖民地意识回归.....	(3)
1.2 僵化观念挡道.....	(6)
1.3 消极否定思维.....	(9)
1.4 漠视现代权威.....	(11)
1.5 病态逆反心理.....	(12)
1.6 偏爱坐而论道.....	(14)
1.7 少付出高索取.....	(15)
1.8 崇尚短期行为.....	(16)
1.9 腐败细胞扩散.....	(18)
1.10 社会责任淡化	(20)
1.11 社会舆论倾斜	(21)
第二章 博 采	(24)
2.1 不卑的危机观念.....	(24)
2.2 难解的集团意识.....	(27)
2.3 残酷的尽职精神.....	(29)
2.4 柔软的思维方式.....	(31)
2.5 坚定的实感主义.....	(33)

2.6	平民的自由文化	(34)
2.7	勤奋的垦荒气质	(36)
2.8	乐观的进取精神	(38)
2.9	开放的兼容风范	(39)
2.10	爽朗的自信性格	(41)
2.11	冲破传统的魄力	(43)
2.12	创造理论的勇气	(44)
2.13	统一意志的民主	(45)
2.14	劳动至上的观念	(47)
2.15	民族自尊的激情	(48)

第三章 更 生 (50)

3.1	华夏神话的现世精神	(50)
3.2	诸子百家的建设思维	(53)
3.3	哲学大师的辩证观念	(55)
3.4	改革先驱的批判艺术	(58)
3.5	民族英雄的牺牲气概	(60)
3.6	嬴政长城的现实光泽	(62)
3.7	太史公氏的原则立场	(65)
3.8	黄河文化的开放扩张	(65)

第四章 听 潮 (68)

4.1	新价值观体系的崛起	(68)
4.2	蔑视精神迷信的勇气	(71)
4.3	引进世界文化的气度	(73)

4.4	更新传统观念的创举.....	(75)
4.5	追求榜样群体的呼声.....	(77)
4.6	推进民主建设的创举.....	(78)
4.7	学习实用知识的兴趣.....	(81)
4.8	躁动开放自立的个性.....	(82)
4.9	积极反思文化的行为.....	(83)
4.10	振奋民族精神的契机	(85)

引　　言

1920年1月，未满而立之年的郭沫若以希望之笔挥就了《凤凰涅槃》这一呼唤民族魂的力作。龙、凤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图腾，但二者的观念内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龙神文化作为生命符号的简单排列组合，是静止观念的物化形象。而在东方和中国人的观念中，凤凰象征着生命的运动和升华，具有超越龙神的精神活力。“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沫若先生正是以凤凰文化这种积极亢进的魅力，来呼唤和激励中华民族精神的更生。

今天，面对世界改革调整潮流的全方位震撼，古老神州深处的文明革命正孕育着新的伟大突破。改革开放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催动着民族精神的自我超越。《凤凰涅槃》发出的历史声音，正在产生振聋发聩的时代回响。

第一章 贫 困

精神贫困是痛彻民族骨髓的贫困。

——编者

中国人历来有买便宜货的嗜好。商店只要一挂上“出口转内销”，“五折作价处理”，“忍痛流泪大甩卖”的“金字”招牌，大家就会一拥而上，拼个你死我活，不亦乐乎。据说这种“业余爱好”具有日益外销的趋势。一个赴日研修生回国后，心情沉痛地介绍了中国同胞在日本“跳蚤”市场的活跃身影。这可能就是古人讲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吧。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人最痛苦的就是深深感到了自己物质上的贫困。但是，在举国上下痛恨物质贫困的同时，人们似乎忽视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中国同样存在着精神的贫困。这种精神贫困正在无情地向每一个社会细胞渗透，成为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无形桎梏。

在某大饭店前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日本客人下车后，准备用人民币付出租车费。中国司机开玩笑地说：

“你们日本完了！过去日本人坐车都给美元、外汇；怎么现在也给人民币了。”不料这位日本客人一听急了。他说：

“先生，请您等等”，说完快步跑上饭店7楼住房，取了50美元付给中国司机，汗流浃背地边鞠躬边说：“对不起，先生，我没有带外汇，我们大和民族繁荣昌盛。”前不久，北

京的外交部招待所和中央广播艺术团各着了一把火，围观者成百上千，其中幸灾乐祸的人居然不少。有的说：“烧了好，谁让你改革的！”有人打哈哈，“名烟名酒刚涨价，烧了怪可惜的”，此类事情屡有发生，发人深省。以上两件事反差之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日两国民族意识的不同，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社会整体精神的一种贫困吗！

这几年，中国人集中精力剖析先人的落伍和文化的夭折，“劣根性”成了最时髦的侃题。实际上，与其骂祖宗无能不如骂自己无用。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面对现实精神贫困的勇气。

殖民地意识回归 中国有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史。在半个世纪中，腐败的清政府与外国签订23个大的卖国条约，丧失国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赔款7.2亿两白银。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竟是英国人赫德。长期殖民地文化的烙印至今还残留在中国的文化的潜层之中。但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在愤怒声讨封建文化时居然对此毫无意识。

前不久，有个中国政府官员在某西方国家讲了句俏皮话。他说，我们两国还有一个重要共同点：月亮一样圆。这其实是个黑色幽默。100年前，外国人在上海租界挂出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曾刺激一批热血青年走上了“五四”爱国道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历史的呼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强烈自信心。可是曾几何时，“中国月亮没有外国圆”的论调又死灰复燃，全盘西化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时尚”。这不能不使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恶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垠土地上，似乎可以看到几个披着改革开放新

衣的二毛子和汉奸。殖民地意识是殖民地文化的产物，是对民族的盲目自卑，对同胞的盲目蔑视和对外国的盲目崇拜。这种殖民地心理在苏联、日本、法国等从未殖民化的国家不存在产生的文化土壤，就是在受到现代文明征服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也很少有过中国某些人对自己文化的沉重失落感。

这几年，一些自称的社会精英孜孜不倦地向老百姓说教：真理出自外国。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倒也真的层出不穷。有人指出，外国人常常发现中国人才，某歌唱家在国外获奖后在国内受到重视，举办独唱音乐会；一部电影因在国外受到称赞而获得国人的青睐；一个问题由于引起外国人重视而得到公正解决；洋博士比土博士的待遇高等等。当然，其中最极端的是盲目赞誉洋宗教，把和尚夸成了一朵花。有的人用外国“真理”压中国真理，丧失了民族的独立思考能力，把外国人的话当作圣经来供奉，这就不能不说这是殖民地意识在作怪了。有人万里迢迢到美国去学习中国的农业改革理论，这岂不有点滑稽。有的人视洋大人为神明，以知晓洋大人通讯地址为自豪，动辄找洋大人告状，希望洋大人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甚至不惜以打自己母亲——祖国的耳光去取悦洋大人。而一些洋大人则拿出80年前洋教士布道的嘴脸来表演。有的人认为外国电台广播的句句是真理，而中国新闻都是胡说八道。现在，老百姓最痛恨的一件事是，各种关于国家大事的信息往往出口转内销。中国人常常要从外国人那里了解中国事。这无形中强化了真理出自外国的心理定势。其实，说句心里话，“外国人那里出过真理”的判断倒有其合理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瓦特的蒸汽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有系统论、信息论和

控制论，以及行为科学等的引进，反映了中国人思想的开放，说明我们有胆识接受科学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由此进行逆判断，“真理出自外国”，那就走向了极端和片面。

殖民地意识回归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毫无道理地把民族化说的一无是处，把革命文化一笔勾销，把剥削文化说成是真、善、美。一位表示要当精英的人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历史错误在于解放，如果沿着殖民化的路走下去，情况会好得多。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否定引起了海外炎黄子孙的愤怒。殖民者历来十分重视摧毁殖民地民族的自信心，因此，他们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那些早已进入坟墓的殖民者至死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心理战在解放40周年后的中国还会有如此令人诧异的效果，真该授他们以诺贝尔殖民文化奖！

几年来，留学热历久不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近代史上，几次留学热潮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几年的留学热潮促进了改革开放，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其积极作用正在显示出来。近几年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留学的有5万多人。这样一支留学大军应当从其总体上加以充分肯定。但是，谁敢否定出国潮中夹杂着大量泥沙，有人在借对外开放之名，行逃脱民族责任之实，人嘛，别什么都拣好听的说，得了便宜卖乖可不地道。有的人根本没打算出国学点什么，只是去兜兜风，镀镀金，捞捞钱，搞一个洋招牌混事。一些留学生出国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借钱买一辆旧车，到处风光风光。有的留学生替导师带学生做试验，居然嫌H₂S（硫化氢）味道不好，搬了把椅子到屋外“用功”去了。有的留学生给本科生判考试卷，不仔细审阅就全部打A，引起美国学生极大不满。据说，美国已有10余所大学拒

收中国留学生。有的人在国外学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绿卡”，不愿承担振兴中华的责任，完全不考虑国家和人民培养他付出的巨大代价。60年代，以钱学森等一批有民族气节的科学家为主掀起回国热潮，同“镀金热”、“定居热”和“回国热”的反差如此强烈，难道还不足以对今天“有识青年”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表示忧虑吗？现在，有的人出国不归总冠之以祖国对不起他的“桂冠”，不少新闻舆论也在支持这样一种说法，留洋就对民族进步有促进，至少可以“曲线爱国”，将来搞一个“叶落归根”。这真是莫明其妙的胡言乱语。谁都明白，出国是从300美元跨向1万美元水平的最捷之径。

其实，“殖民地意识回归”这个问题本身就肯定会有争议。“殖民地意识”的内涵是：丧失民族气节，丧失民族自信心，盲目崇拜外国，盲目否定自己。中华民族曾受到百年的殖民统治，殖民地意识象封建思想一样源远流长，但其在今天的重新抬头具有客观性，只有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开放可以消除对洋大人的盲目崇拜，发展生产力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物质基础。我们反对用封闭的夜郎思维方式来克服殖民地意识，盲目自大和盲目自卑实际上是一回事。

僵化观念挡道 晋代的陶渊明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某公在桃花源遇到了一群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观念被封闭在1000年以前秦末的那个世界中。这些人还身着秦代衣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现实世界茫然不知。这本是个幻想，谁想到今天居然成了事实。本世纪80年代，有几个老先生骑着毛驴去参加会议，当听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时，

他们勃然大怒：“你们还是共产党，还搞社会主义吗？”看来，这几位老翁颇有“洞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现实中，这种桃花源居士大有人在。电影《芙蓉镇》中有个极端的典型——王秋赦，由于精神分裂，他的观念永远停留在了那个血腥的运动年代，那一声声“运动喽”的喊声令人痛彻肺腑。

1988年8月4日，哈尔滨市香坊浴池综合总店职工甄国华用极其残酷下流的手段迫害了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何某（女）。案发后，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有人提议，尽快建立厂长、经理的热线电话。其实，甄国华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正是传统的“主人”观念给他以行凶的道义勇气。这种观念是目前企业进行优化劳动组合逾之维艰的思想障碍。

解放近40年来，我们创造了一个关于“主人”的绝对化理论：企业属于国有，国家属于人民，因此，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而现实中工人职业本身仍是一种谋生手段，主人身份和谋生职业之间出现了难以统一的两难；在制度上，理论的主人地位没法落实，而在观念上，主人的虚假优越感则深入人心：你企业有何权解雇工人，你厂长有何权调动主人。

“甄国华们”正是在这种观念鼓励下动刀杀人的，并且可以断定，他的行为还会有同情者。这样一个荒唐的主人观念不但造就了大批吃社会主义的懒汉，而且成了改革深化的拦路虎。北京有个300人的企业，1985年搞优化劳动组合时，厂领导受到几十人的轮番“围剿”。观念力量之伟大，由此可窥见一斑。

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传统的“主人”观念必须更换，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在整体上人民作为国家

主人的地位，是通过党的领导、公有制、法律和政策加以保证的。企业作为商品经济的细胞，要与工人建立新型的经济契约关系，大家都可以在经济规律制约下进行自由选择。厂长、经理作为法人代表而充任企业对工人劳动的仲裁者，应当拥有选择工人的权力。中国的一亿企业职工如果冲不破传统“主人”观念的束缚，劳动制度改革措施就可能“汤泡饭”，企业效益就难以提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失败。

1980年3月，有人走访了首都38所高校的800名学生，其中关心知识分子待遇的占80%，大家说起来慷慨激昂：“过去是读书越多越反动，现在是读书越多越受穷”，“女同志最讲实惠，现在她们理想的丈夫是厂长、经理、有海外关系的人，穷知识分子不吃香了”，“中国知识分子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有的学生说：“我们已从时代的宠儿变为时代弃子了！”一个研究生说：“过去我们是站在山顶上，看得挺远，可是风（商品经济风）一吹，身上的油水都干了，现在要下海捞鱼（赚钱）了。”同学们的牢骚是有道理的。目前，整个社会收入中的脑体倒挂问题远没有解决。但是，从同学议论中可以感到，他们正在用过时的知识分子观念折磨自己。

过去，知识是作为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有了知识，即便不干事也应享受相应待遇。现在，知识要进入商品市场，只有转化为生产力，被社会承认时，它才具有社会价值。当知识价值问题发生如此巨变时，作为知识自然载体的知识分子必然很不习惯，甚至会感到痛苦。但是，不管人的主观意志如何，知识进入市场势在必行。有个研究生说：“大学生是什么东西？过去是劳心者，现在是商品，要进入市场让人家挑选和退货。”有个大学生分到企业后工作不顺

心，就到处告这个工厂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际上，所谓落实政策是“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历史问题。现在，再讲这个是可笑的。社会已经学会用实用眼光看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从封闭观念中解放出来，就会在商品经济的新天地中大有作为。

消极否定思维 有位大学教授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人偏爱否定思维方式。判断一件事，外国人往往先想它有何可取之处，而中国人常常首先找毛病，对人亦然。1988年4月召开的全国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会议，气氛空前热烈，开了“两会”民主风气之先，使国内外耳目一新。但值得思考的是，两会的思维方式陷入单一否定的泥潭。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慷慨直言，切中时弊，忧国忧民之心感人肺腑，可惜否定意见占了大多数，建设意见微乎其微，虽苦心可嘉，然于事无补。据说，在其它一些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做否定发言理直气壮，做建设发言理亏气短的“否定民主”空气，以至于有人认为，现在讲正面话比讲反面话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中国终于到了喜欢骂人和喜欢听骂的全新历史时期。

这两年，中国人似乎有发牢骚的业余爱好，大家好象对一切都不满意。现在，人们坐车发牢骚，上班发牢骚，写文章发牢骚，过党团组织生活也发牢骚……发牢骚已经成了当前一种无孔不入的特殊文化现象。现在，中国发牢骚已经有了定势，一般开头是：“嗨，现在中国的事没法弄！”而结尾关于问题原因的分析总是与己无关，多半是上面和别人的罪过，至于解决问题的招儿，按惯例是：没拿这份钱，谁操这份心。发牢骚这种文化现象有其积极的内核，表明了中